

虛無成爲一種主義

以俄國小說《灰色馬》

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1920-1950s)為例

邵悅

國立清華大學

摘要

本文首先通過回顧《灰色馬》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分析其如何上承過去對俄國虛無黨與虛無主義的認識，下接早期左翼文人的革命論述；其次，以曹聚仁針對《灰色馬》的分析為線索，比較其不同時期的「虛無」書寫，梳理出一條難以被左派或右派所界定的關於革命與虛無主義的思想脈絡。本文認為，即使在左翼陣營內部，對於虛無主義也不全然是鐵板一塊的解讀，瞿秋白和茅盾試圖用革命史或民族思想史來詮釋主人公佐治，鄭振鐸則選擇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理解。而曹聚仁在不同階段對於虛無主義的界定也不盡相同，從一開始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烏鴉主義，到後來漸趨不可言說的哲思妙趣，再到《酒店》這本受《灰色馬》影響頗深的小說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鬥爭與殖民地香港之畸形繁榮的描摹與暴露，折射出知識份子與革命歷史之間複雜而多重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虛無主義、《灰色馬》、鄭振鐸、瞿秋白、茅盾、曹聚仁

February 3, 2024 收到稿件 / May 15, 2024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 58 (January 2025): 73-96

§ 邵悅，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Email: shaoyue19941020@gmail.com

前 言

一九二二年，《小說月報》分五期連載了俄國作家路卜洵(V. Ropshin; Boris Viktorovich Savinkov, 1879-1925)的作品《灰色馬》(*Конь бледный*, 1909)，一部講述了以男主人公佐治為首的俄國社會革命黨人之暗殺運動的日記體小說。由於俄文程度幾乎為零，^[1] 鄭振鐸(1898-1958)選擇從俄國翻譯家齊奈達·文格洛娃(Zinaida Vengerova, 1867-1941)的英譯版《灰色馬》(*The Pale Horse*, 1917)^[2] 進行轉譯，並於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除了鄭振鐸本人所寫的〈譯者引言〉(1922: 5)，值得關注的還有同樣登載於《小說月報》的幾篇評論文章，以瞿秋白(1899-1935)、茅盾(1896-1981)所作的序言為代表。

結合當時為數不多的廣告宣傳來看，《灰色馬》以其反映歷史的價值與俄國革命深度捆綁，例如《學生雜誌》將其視為研究俄國革命運動與思想之必讀書目，認為青年能從中獲得社會革命的經驗教訓（書報介紹 119-120）。據時任《小說月報》主編的茅盾所說，自連載《灰色馬》之後，還不曾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他猜測是否因為中國青年已經厭倦了「革命」二字（沈雁冰1）？不過，《灰色馬》在此後一直未能引起廣泛的討論，甚至在作者路卜洵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也不曾掀起波瀾。有人將此歸咎於近來讀者更喜歡「軟性」的出版物，像《灰色馬》和魯迅(1881-1936)譯自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Mikhail Artsybashev, 1878-1927)的《工人綏惠略夫》等作品遂無人問津（最後一頁 8）。所謂「軟性」和「硬性」，自然讓人聯想到知識分子在一九三〇年代關於中國電影的軟硬之爭，軟性指代所謂審美的藝術性，硬性則意味著內容思想上的左傾意識型態。^[3]

作為左翼文人眼中的硬性革命文學，《灰色馬》對於作家曹聚仁(1900-1972)而言，卻以「虛無主義」為關鍵詞而激盪起了別樣的思想。一九五六年，移居香港的曹聚仁在《文藝新潮》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虛無主義：灰色馬〉，從小說批評談論至時局現實，抒發他對於知識分子同虛無主義之關係的看法，強調了文藝同政治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矛盾（曹聚仁 1956: 10-12）。距離鄭振鐸翻譯《灰色馬》已有三十餘年，曹聚仁的這篇文章追憶了自己初讀鄭譯版《灰色馬》時，那種發瘋似的體驗以及讀完後失戀般的惘然。足證鄭振鐸、瞿秋白等左翼知識人的翻譯與傳播，多年後仍留有其

中介的痕跡，草蛇灰線般將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大陸一路串連至一九五〇年代的殖民地香港。與此同時，曹聚仁對《灰色馬》的解讀，又呈現出該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接受情況不止革命研習這一種路徑，還牽涉到生命、悲劇等哲學議題，尤其為左翼文人所批判的虛無主義反受到曹聚仁的推崇，成為其後續文藝批評與創作的重要資源。

本文將回顧《灰色馬》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分析其如何上承過去對俄國虛無黨與虛無主義的認識，以及如何下接早期左翼革命論述；並以鄭振鐸、瞿秋白、茅盾的譯介與評論文章為代表，分析一九二〇年代的左翼知識分子如何面對俄國早期革命經驗及其革命黨人內部的虛無主義思想；由此對照曹聚仁自一九三〇年代以降的虛無主義論述，理解其對《灰色馬》的充分體認，梳理出一條難以被左派或右派所界定的關於虛無主義、革命、知識分子的思想脈絡。

壹、虛無主義在中國

一般認為，首位使用現代意義上的「虛無主義」(Nihilism)者，是德國哲學家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19)，說的是像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那樣不遺餘力地推崇啟蒙並用理性精神來質疑一切，必然會消解掉人們心目中那些崇高神聖的價值，使內心日益空虛(劉森林 2-3)。到了俄國，虛無主義的傳播與流行主要藉助了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的長篇小說《父與子》(1862)，其中的男主人公巴札羅夫是一位愛好科學的虛無主義者，自詡不向任何權威低頭，不把任何原則當真(Turgenev 206, 210)。然而，自一八七〇年代始，虛無主義者的標籤逐漸被用來形容俄國民粹派和社會革命者，尤其是歐洲的新聞報紙，往往將俄國從事暗殺活動的革命黨人統稱為虛無主義者(范利偉 28)。

清末，虛無主義從俄國經由日本傳入中國，這一相對曲折的路徑使得晚清知識分子最開始接觸的虛無主義，與民粹主義、民意黨、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概念相混雜，以暗殺為手段的無政府主義虛無黨與現代哲學意義上的虛無主義幾乎成了同一件事。譬如一九〇二年，曾經投身於暗殺革命的蔡元培(1868-1940)等人於上海創辦的愛國女校，開設了以法國革命、俄國虛無主義以及虛無黨故事等為內容的歷史課程，虛無黨與虛無主義之間似乎是實

踐者及其指導思想的關係（金璐潔 64）。一九〇三年，梁啟超(1873-1929)在〈論俄羅斯與虛無黨〉一文中認為虛無黨始於文學革命（中國之新民 65）。不過，很快就有學者指出二者的差別，例如一九〇七年創刊於東京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刊登了〈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一文，作者署名「獨應」（即魯迅、周作人在日本期間共用的筆名），該文批評了中國知識界將「虛無黨人」混同於「虛無論者」（nihilist）的現象，認為這無異於「以哲學問題混入政治」，相去不知凡幾（獨應 2016: 190-191）。在鄭振鐸翻譯《灰色馬》的同一年，他為耿濟之(1899-1947)所譯的《父與子》(1922)作序，強調虛無主義與虛無黨在人生觀上的差異，前者是從科學思想發生出來的反抗思想，後者則否認一切。（鄭振鐸 1998: 404）

在一種相對混雜的狀態下，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虛無主義和虛無黨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在政治意義上，虛無黨曾得到梁啟超的高度評價，他分析虛無黨之所以採取暗殺而非暴動的手段，是考慮到自身兵力、號召力等侷限，具有相當的現實依據（中國之新民 67-69）。相似的還有「獨應」的觀點，雖然沒有進行褒揚，但也主張認清歷史背景，強調虛無黨之恐怖手段是因應俄國的時勢，絕非「以喋血為快」（獨應 2016: 190-191）。鄭振鐸則肯定了虛無黨多年來改變方針、鼓吹農民的基礎性作用，視其為十月革命成功之關鍵（鄭振鐸 1920: 3）。

反之，在思想層面上，持批判態度者居多。陳獨秀(1879-1942)認為，中國思想界是包括俄國虛無主義在內的「世界虛無主義」的集中地，嚴重阻礙了青年對實際生活的感知和對社會黑暗的改造，誤以為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是最高尚、最徹底的思想，最終發狂自殺或卑劣墮落（獨秀 1920: 137）。鄭振鐸認為，巴札羅夫式的虛無主義傳入中國後失去了原先的科學立足點，變成像虛無黨人般否認一切，乃至否定人類與生死，即便主張革命，也只是「玄想的革命」（鄭振鐸 1998: 404）。哲學家朱謙之(1899-1972)從哲理層面出發，批評俄國的虛無主義沒有確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在學理上遠不如康德的實驗主義與叔本華的厭世主義（朱謙之 48）。

綜上可知，經由多地譯介流轉而來的虛無主義，在出離了早期的混沌之後，在哲學和政治的雙重脈絡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不同時期的中國現實時的參照對象。而《灰色馬》的到來，恰如鄭振鐸所說，代表了一種與《父

與子》的人生觀有著本質差異的虛無主義（鄭振鐸 1998: 404）。一九二〇年代初的左翼知識分子如何在革命思想的維度上理解佐治式的虛無主義，無疑是我們考察《灰色馬》這本小說的傳播與接受史的價值所在。

貳、左翼眼光下的《灰色馬》：以鄭振鐸、瞿秋白、茅盾為例

小說《灰色馬》的主人公佐治，是一個不相信任何主義也不信奉任何神明的俄國社會革命黨人，過著以暗殺為目的的祕密生活。關於社會革命黨，佐治既不關心它的鬥爭路線，也不在意它的未來發展，既不尊重老革命家，也不服從中央的決議；關於民眾，佐治一方面用神聖的字句宣稱「我要給你們以晨星」，但在他眼中，羣眾不過是一羣懶惰無知者，他們對於革命黨人也充滿了不解和誤讀；關於暗殺，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例如亨里契、費杜爾、愛爾娜、佛尼埃都有各自投身暗殺運動的緣由以及對暗殺目的的解釋，只有佐治無言，他認為目的並不重要，手段也可以是目的本身；關於宗教，佐治認為所謂神的存在，不過是人在危急關頭的恐怖感所造成的錯覺。已有研究者從聖經的角度切入，分析《啟示錄》在《灰色馬》中的引用及討論方式，認為佐治看到了俄國革命帶來的新舊之變與聖經中的復活母題有著微妙的關聯，但他在否定的意義上將二者聯繫起來，證明其並非為了重生後的物質世界而革命，他更關心革命的過程本身而非新的社會秩序。^[4]

幾乎所有的評論者都高度肯定了《灰色馬》的藝術價值，認為其在俄國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位置。在瞿秋白看來，《灰色馬》的價值源自俄國文學長久以來的偉大傳統，即文學因藝術的真實而偉大，該國的文學史與革命思想史向來緊密相連，不論作品的內容是頹廢或進取，都響應其實際的生活。瞿秋白尤其強調了俄國文學作為民眾情緒的表現形式，由於社會各流派之系統思想在逐漸成為理論之前，必有一種「普通的民眾情緒」為先導，民眾情緒既是社會新思想的基礎，也是舊思想退潮之後的剩餘（瞿秋白 1）。瞿所謂「藝術的真實」，意思是雖然路卜洵本人不是一個真實的反抗者，但他能用文學陶鑄鍛鍊出生活中的美，並進行真實、誠意、無所偏袒的描畫，恰如佐治一角被瞿秋白視為社會革命黨中虛無主義者的典型，使得《灰色馬》足以作為一種另類的革命黨史供後人研究。從一定程度上說，瞿秋白認為文學能夠把握住一個時代的新舊情感模式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這一觀點與雷蒙

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之「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有相通之處。學者黃詠光也是從思想情感的角度回看瞿秋白的這篇序文，認為《灰色馬》確實代表了民粹派思想在社會經濟生活瀑流轉變之下，無法跟上社會情緒而即將熄滅，而到了其末流強烈的頹廢虛妄論調(黃詠光 165)。不過，較之文學批評，瞿秋白在序言中談得更多的還是革命史實，例如恐怖主義、暗殺運動、社會革命黨的組織運作以及路卜洵本人的政治經歷，通過梳理恐怖主義在俄國的發展，分析其如何負面性地影響一個黨組織及其成員的人生價值觀。

同樣從藝術反觀現實，茅盾在序文的開篇就要求「我們」必須對小說中的佐治採取一種明確的態度(沈雁冰 1)。所謂「我們」，結合全文可知是茅盾對中國青年的一種革命性召喚，而所謂態度之「明確」，即否定性的批判眼光。與瞿秋白一樣視文學為政治思想的直接反映物，茅盾以三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來標記俄國革命黨的三個階段，分別是：斯底普涅克(Sergey Stepnyak-Kravchinsky, 1851-1895)、阿爾志跋綏夫(Mikhail Artsybashev, 1878-1927)以及路卜洵。這三人筆下的革命黨人從冷靜理性，發展到感情熱烈，其革命目的日漸模糊，革命信念也不復堅定，最終在《灰色馬》中徹底喪失(沈雁冰 1)。茅盾認為，《灰色馬》所代表的第三階段證明了暗殺這一革命手段不僅不能成事，還會招致社會的憎惡，實在是錯誤的選擇。與梁啟超不同的是，茅盾並不認為暗殺是社會革命黨在權衡利弊後所作的理性選擇，而是「俄國民族的極端性」的惡果，他以走路方式來比喻俄人思想上的極端性，稱其一意孤行，若發現此路不通便徑直走向另一極端。雖然茅盾期待中國青年能夠透過《灰色馬》燃起對於社會革命的熱情，但也怕有人誤以為憑藉「幾個『殺身成仁』的志士」及其「手槍炸彈的威力」就能改變人心之麻木，茅盾還是希望中國青年牢记「以有組織的民眾為武器」才是正確的方案策略。產生相似疑慮的還有郭增愷(1902-1989)，他擔心《灰色馬》在「利己觀念」這一思想層面上太被中國青年所認識，恐將催生出無數「任事不作、一切反對且只求目前幸福的中國佐治」(增愷 1924: 4)。

較之瞿秋白與茅盾所作的意識型態批評，鄭振鐸選擇在引言的部分稍稍抽離出小說背後的歷史脈絡，聚焦於虛無主義作為一種思想的表現及原因。據鄭振鐸自陳，翻譯《灰色馬》有兩大原因：一是感動於書中大膽直率的思

想與美麗真切的藝術；二是考慮到像佐治那樣的中國青年越來越多，該書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這類人的思想(鄭振鐸 1922: 5)。可能是熟讀文本的緣故，鄭振鐸不僅著眼於主人公佐治，更從小說中對於亨里契、費杜爾、愛爾娜、佛尼埃等革命黨人的描寫中，看到了目的相同的革命者其實也各懷「複雜而不同的動機」。於是，鄭振鐸提出有必要認清佐治雖為核心人物，但他只能代表局部且有限的俄國革命精神，而非整體性地為革命黨人代言。

鄭振鐸認為虛無主義是近代普遍的精神問題，而非某個恐怖黨的個例；較之「五四」以降熱議不斷的所謂民族性，鄭振鐸更感興趣的是殺人者的心理。鄭振鐸認為，佐治身上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式的任性而動，小說中依梨娜這一人物的名言「接吻吧，不要思想了」最能代表佐治想要的生活。然而，思想又總難遏制，於是佐治便領受了尼采的超人主義，成為一個冷酷而忽視一切的人，最終走上自殺末路。在鄭振鐸看來，佐治的殺人既不是為了任何主義，也不是為了愛，是他不願意生活著和平的生活而「欲以流血為喜悅」。有趣的是，這一點恰恰是「獨應」之〈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一文所反對的。但在鄭振鐸的理解中，嗜血的心理也有其原因，它的背後是「生的厭倦與生的懷疑」，是一種具有時代性的精神症候。換言之，鄭振鐸之所以譯介《灰色馬》，是因為他覺察到了該書所負載的跨國族、跨語言、跨文化的負面情感經驗，對於身處過渡時代的中國青年無疑是有參考價值的。

參、曹聚仁：一個虛無主義者的文學自白

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一系列清黨行動之後，隨著革命文學及其論爭的愈演愈烈，即便是分屬不同陣營的左翼知識分子，其所追求的文藝理想也因應時局的動盪而趨於與無產階級相結合的革命書寫，《灰色馬》這類帶有個人主義成分與虛無主義色彩的作品日漸淡出左翼文學的譜系。但在一九五六年香港，曹聚仁在《文藝新潮》上發表了〈虛無主義：灰色馬〉一文，將《灰色馬》這本小說凝鍊為「我們是不能相信革命的」這一結論，而虛無主義則是「一個對於生命究竟問題沒法交待所擬定的結論」(曹聚仁 1956: 10)。曹聚仁談及瞿秋白、鄭振鐸、茅盾所作的序以及俞平伯(1900-1990)寫的跋文，特別提到瞿秋白的評論也觸及到了生命究竟的問題。不過，曹聚仁並不像瞿

秋白那樣進行歷史性的爬梳，他所依傍的是叔本華、屠格涅夫、老子等人的哲學、文藝思想而非社會學的方法。

根據曹聚仁在〈虛無主義：灰色馬〉一文中的回憶，他是在一九二三年也就是二十歲時初讀鄭振鐸翻譯的《灰色馬》，當時他正好在看叔本華的悲觀哲學，遇到這本小說便發瘋似地連夜讀完了，「惘然地對著微明的東方，不知所云」，這種不可名狀的精神致使曹聚仁的妻子誤以為他「碰到了什麼重大打擊有如一個失戀的傻子」，甚至疑心他會自殺（曹聚仁 1956: 11）。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偉大的字眼」中，曹聚仁認為《灰色馬》提出「我們是不能相信革命的」，小說關於「自由」與「社會主義」的論述呈現出了一個「永遠不能消解的矛盾」，即一種既不相信「自由」也不相信「社會主義是地上天國」的否定姿態（曹聚仁 1956: 11）。這種雙重否定看似矛盾，本質是對社會理想的完全拒絕，背後是對現實政治的失望與悲觀。曹聚仁進而援引魯迅在一九二七年於暨南大學的一次演講，認為他在革命陣線分裂之際看出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也就是演講中提出的文藝家不論在革命前、革命時還是革命成功後都難以得到社會的認識與同情：「文藝顯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曹聚仁 1956: 11）。曹聚仁認為魯迅看到了文藝與革命的關係中「更真實的一面」，直指革命成功後也不會有革命文學的空間，一方面頌揚革命的不能算作革命文學，另一方面，若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繼續批判現狀，則會走上革命時代那樣不是流亡就是被砍頭的命運。曹聚仁由此總結：「虛無主義伴著文藝，成為她的根苗，乃是必然的，而一個文學家，滿是濃重的虛無氣氛，也是必然。他們不滿意於現實，而遠遠看著將來」（曹聚仁 1956: 12）。

對於曹聚仁而言，《灰色馬》及其虛無主義意味著個人與思想主義等意識型態之間那不可調和的矛盾，由於任何一種理想信仰都無法避免流血犧牲的暴力，所以在曹聚仁看來，這就意味著知識分子無法避免地都會陷入對於現實政治的虛無氣氛之中。

曹聚仁所處的一九五〇年代香港，在世界地緣政治的舞臺上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對香港文壇而言，大批文人南下造成了種種的「色彩」變化，尤其隨著美國新聞處在港的建立和運作，大量以難民為題材的反共文學在美元文化的時局背景下進行生產，例如趙滋蕃(1924-1986)的《半下流社會》(1953)、

林適存(1914-1997)的《鴛鴦》(1953)、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1954)；以及相對應的反反共文學，例如阮朗(1919-1981)的《某公館散記》(1951)等等。而曹聚仁的長篇小說《酒店》(1954)在「左」與「右」的交鋒之間，被認為是相對中立的作品。^[5]

值得注意的是曹聚仁所選擇的發表平臺《文藝新潮》，一本在一九五六年創刊的文學雜誌，內容上包括大量譯介的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和作品，以及具有現代色彩的香港詩歌，還有小說、評論等等。據黃萬華的研究，《文藝新潮》的前身是馬朗(1933-)創辦於一九四四年上海的《文潮》雜誌，雖然馬朗當時思想左傾，但其創刊目的在於「不忍坐視有閒階級的消遣品文化糟蹋中國文化」(黃萬華 59)。回到《文藝新潮》的發刊詞〈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其中援引了亞當、夏娃偷食禁果的神話，用來隱喻當下的黑暗時局，渴望以一場文藝復興來迎接人性的復歸，而《文藝新潮》正是一個讓人敢哭、敢歌唱、敢說話的烏托邦。所謂「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很明顯引自斯大林(1878-1953)，並試圖與蘇聯以及中國大陸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進行意識型態層面上的對話。據陳桂生(1933-)的考據，「人類靈魂工程師」是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代針對作家羣體所提出的一句稱呼；一九三九年，蘇聯教育家加里寧談到教育家就是人類心靈的工程師；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在〈穩定和發展小學教育〉這一篇社論中提出「教師是人們靈魂的工程師」(陳桂生 408)。不論是作家或教師，在無產階級革命論述之中，尤其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為綱領的文化改造氛圍之下，知識分子都被賦予了相當明確的寫作任務，即以工農兵為服務對象、寫作對象以及學習對象。而《文藝新潮》試圖吸引知識分子至「我們」的旗下，顯然欲拉攏那些並不隸屬於左右陣營也不見容於政治派系鬥爭的文藝創作者，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南來文人。上述「我們」與茅盾在一九二三年所說的「我們」，召喚的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人羣，後者是潛在的革命者，前者避革命而不及，但他們都期待自身對於青年知識分子能夠有精神號召力。趙稀方認為，從歷史上看，《文藝新潮》衝破了當時香港文壇的美元文化思潮，通過大量翻譯存在主義小說、現代詩等銜接了中國在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的現代主義和純文學傳統，填補了漢語翻譯文學的很多空白；但現代主義本身也是一種資本主義政治意識型態，雖然《文藝新潮》反

對政治對文學的操縱，反對綠背文學，但並非贊成左翼政治，其翻譯和創作的內容中不乏排斥左翼政治的文字以及反共的小說（趙稀方 2017: 66-78）。

了解到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文壇景況以及《文藝新潮》所處的意識型態位置，似乎曹聚仁的形象已躍然紙上，即一個政治虛無主義者，然果真如此嗎？如果我們回望一九三〇年代的曹聚仁，尤其是他登載在自己創辦的《濤聲》週刊上的文章，就會發現他最初自我標榜的虛無主義，不僅與一九五〇年代的想法有所不同且一路都有持續性的變化，政治固然是一方面，但哲學與美學的範疇同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現實批判

作為《濤聲》的創辦人，曹聚仁在一九三一年為回應當時針對該雜誌之政治色彩的非議，特作〈我們的顏色〉一文強調其立場的中立，不過是幾個讀書人「蒙著一重虛無主義的氣味，對於現狀開玩笑罷了」，直到日寇入侵才從玩笑轉向正面批評現狀的嚴肅態度（曹聚仁 1931: 1-2）。曹聚仁猶記清黨之恐怖，遂怒斥造謠者之狠毒，畢竟「這個年頭，『共產』二字每與坐牢殺頭相連」（曹聚仁 1932:2-3）。此時，曹聚仁所謂的虛無主義還只是一種文人氣，雖然在理論層面或屬無政府主義，但在實踐層面與之截然不同，尤其對立於被挪用作升官發財之道的中國無政府主義（曹聚仁 1933: 1-2）。換言之，曹聚仁無心於終南捷徑，但也不是隱逸派，他自詡為徹底的懷疑論者，足證他這一時期所體認的虛無主義，具有相當的現實批判性。

曹聚仁強調自己並非否定一切的極端虛無主義者，也不是說風涼話的，而是「在苦悶的空氣之下，而正對著現實，拼命自己找出路」（林丁、曹聚仁 6-8）。此種依傍現實而生、尋找出路而去的批判式虛無主義，甚至還帶有些許階級鬥爭的意識，例如曹聚仁頗留意社會生產與分配的問題，關心土地農民，他曾藉用《紅樓夢》來諷刺民生現狀，質問：「從史太君到焦大，誰是乾淨的？」（曹聚仁 1932: 2-3）。曹聚仁以「烏鴉主義」象徵《濤聲》之思想調性，並以烏鴉入畫作刊物標誌，彰顯一種「在人家屋簷上亂叫而惹人不高興的批評姿態」（曹聚仁 1931: 1-2）。曹聚仁清楚認識到虛無主義者對於行動力的匱乏，較之批評此種局限，他更強調造成這一能動性缺失的社會環境。曹聚仁認為，虛無主義不僅批判現實，更直接地反映出時代的黑暗，譬如屠格

涅夫筆下的羅亭一類的虛無主義者之所以淪為「口的長人，手的侏儒」，正是拜統治階級的高壓政治所賜（俞人生、曹聚仁 8）。

值得一提的是，曹聚仁的弟弟曹義(1909-2000)也是《灰色馬》的讀者，他曾以「胡銘」為筆名發表文章，其中談到了自己在讀了《灰色馬》之後「對於革命事業也覺得不妨開開玩笑」，直到目睹日本和蘇聯在東三省的經營，頓覺對於中華民族而言，虛無只是消極的懷疑，沒有勇氣幹便沒有出路（胡銘 2-3）。曹義的這篇文章登載於《濤聲》創刊的一九三一年，雖然他兄弟二人未必意見相通，但既然予以發表，至少證明雜誌同人能夠理解曹義對於虛無主義的批判以及對革命事業的擁護，尤其該文以「從莫斯科歸來」作標題，若以後見之明來看，則有招致赤色嫌疑亦無所懼的魄力。

在記述一九五〇年前後事跡的《採訪三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南來香港的曹聚仁依舊以虛無主義者自居，從這一時期開始，曹聚仁的虛無主義有了明顯的三種傾向，即政治的虛無主義、宗教的虛無主義、生命的虛無主義，前者作為後兩者的前提，構成了曹聚仁思想意識型態最重要的基礎。關於宗教，曹聚仁進行了一番嚴正的批判：起因是其教導的一個孩子（他稱之為虛無主義者的門徒）突然訴諸宗教，令曹聚仁非常不解，他認為一個真正的虛無主義者決不會逃避到教堂之中（曹聚仁 2007: 4）。曹聚仁進而批判那些試圖解釋一切的傳教者，這些妄人最該解釋卻諱莫如深的是宗教戰爭，何以教徒之間為了信仰而相互殘殺（曹聚仁 2007: 5）？面對傳教者所不敢面對的血淋淋的史實，曹聚仁認為虛無主義是所有人的歸宿。關於政治，曹聚仁明確表示自一九二七年後，他下定決心「不參加任何政黨組織，也不捲入任何政治鬥爭的漩渦」，至多是一個「看革命的旁觀者」（曹聚仁 2007: 9-10）。

關於生命無常所造成的虛無感，曹聚仁更能與之產生共鳴，他在〈前詞：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獨白〉一文中，同時提及了《灰色馬》與明代文人歸有光(1501-1571)的〈項脊軒志〉這兩部文學作品，試從文藝的角度闡釋何謂虛無及其何以成為主義。其中，關於〈項脊軒志〉的部分較短，但頗耐人尋味：

三十多年前，我愛讀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究竟為什麼，這原因也說不出來。不過愛好的程度，與年俱進，那是真的。其中有一句，說他的妻子歸寧，那些小姨們問她：「聞姊家有閨子，且何為閨子也？」這話是無從答，不能答，而且不必答的。莊子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答就有不答的妙處。這便是我所

了解的虛無主義。(其實，我這麼說，也是多餘的。)

(曹聚仁 2007: 4)

按創作時間，〈項脊軒志〉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四段作於年少之時，後來才增添補記(田干生 43-46)。前期所寫的是關於項脊軒多年來的人事變幻，待歸有光經歷了妻子亡故等人生變故，才有那段寫妻子歸寧時娘家姊妹們好奇地問什麼是閣子的話。南閣子的風貌是所有讀者都清楚明白的，但「何為閣子也」的問題卻在文中被省去了回應。曹聚仁認為此處的省略是「無從答，不能答，而且是不必答的」，充分表達出虛無主義的內涵(曹聚仁 2007: 4)。不作答並不是說故意不理睬問話者，而是妻子當年轉述此事的情景猶在眼前，待歸有光落筆時，已人去樓空，南閣子也不復當初。歸有光採用了無聲勝有聲的筆法，暗示人生走過了歡樂的時光，緊接著便是蕭條散場。曹聚仁亦援引道家思想，認為歸有光的不作答即莊子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結合其後文對自詡無所不知的傳教士的鄙夷，可知曹聚仁所謂的虛無主義，指的是難以宣之於口的生命真諦。

同為創作者的曹聚仁，自覺能從〈項脊軒志〉的文字技巧中感到「不答有不答的妙處」，從其敘述節奏中領悟到生命中那些戛然而止的美好和猝不及防的崩壞，遂用虛無主義來詮釋個體面對世事無常的失語狀態。不答、不響本身也是一種態度，既避免自陷於濫情式的感傷，從中提煉出藝術之深刻性從而發人省思；又能表達出個人遭遇社會、國家、世界等宏大命題時所呈現出的渺小疲軟。這一點無疑與曹聚仁對《灰色馬》的理解產生了微妙的連結，他認為主人公佐治正是看破了一切主義信仰以及一切政治領袖與當權集團之可笑，遂走向了「政治的虛無主義」而非虛無黨，這也是他基於個人政治經驗的直覺感悟。曹聚仁在該文的結尾處有一段頗為果決的自陳：「除了『愛情』以外，我不相信還有使我們值得犧牲的東西；我是一切政治集團的反對派，一切領袖的叛徒。我只有一个上帝，她是我的愛人！」曹聚仁之所以宣稱愛情是唯一值得為之犧牲的信仰，在於批判「政治人物與政治集團把戲」，亦否定了現代革命政治所仰賴的個人之犧牲奉獻的正當性。在此基礎上，我們重新回顧〈虛無主義：灰色馬〉一文，尤其是第一部分「『虛無』頌」中的這段話，更容易理解他如何透過《灰色馬》這一中介抒發個人對社會現狀的思考：

依我的說法，一個有頭腦的中年知識份子，一定是虛無主義者；而古往今來的文學家，只要算得上是作家，他們也一定是虛無主義者。我的這位朋友，雖說在北京住了好幾年，一到了香港，依然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我以為大陸中國若干問題，都是可以解釋的，只有把魯迅拉入神龕，奉之為神明，畢竟是不可解的。因為魯迅的虛無主義色彩那麼濃厚，正和樂觀的社會革命是不相容的，結底看來，那位馬克思主義信徒，也還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曹聚仁 1956: 10）

此時的曹聚仁將虛無主義界定為「一個對於生命究竟問題沒法交待所擬定的結論」，相當於一種暫時性的自我安頓，帶有無可奈何的意味。曹聚仁還援引了屠格涅夫關於自然的觀點，即自然非善亦非惡，它是「無所謂」的，與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說法相同。由於自然天地的不悲不喜，人類的悲喜亦充滿了隨機與偶然，曹聚仁將此種無法解釋的隨機與偶然上升為一種名為虛無的思想主義，即破除一切迷信但信仰虛無。值得注意的是曹聚仁對於道教玄妙沒有什麼興趣，他宣稱中國問題皆有其現實依據可循，只是將魯迅神聖化令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此處所欲對話的對象顯然是中國共產黨對於魯迅的崇高定位，以〈新民主主義論〉(1940)為代表，毛澤東(1893-1976)曾將其奉為文化革命的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 36)。

曹聚仁卻在魯迅身上看到了以虛無主義為底色的生命狀態，他認為魯迅非但不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且對政治、革命都取消極的態度。然而曹聚仁過去對魯迅的評價，雖然始終圍繞著「虛無主義」這一關鍵詞，但一九三〇年代的他尚以發展的動態視角來較為客觀辯證地把握魯迅的革命觀，認為他經歷了從悲觀到不那麼悲觀的意識轉變。譬如在〈魯迅的性格〉(1937)一文中，曹聚仁認為魯迅後期努力克服個人主義的氣分，漸漸遠離了虛無主義從而投入社會主義（曹聚仁 1937: 178-179）。到了《魯迅評傳》(1956)這本專著中，曹聚仁卻格外強調魯迅在政治上的虛無色彩，他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麼成就，在文藝觀念上也是自由主義者，對於革命文學也不覺得有多大的意義（曹聚仁 1956a: 155, 195）。曹聚仁認為自己和魯迅至少有一個共通點，

那就是無論面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還是後來的解放運動，他們都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曹聚仁 1956a: 198）。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解讀同一句話，即魯迅引述匈牙利詩人裴多菲(Petőfi Sándor, 1823-1849)的名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 1925: 4），在一九三七年的曹聚仁看來，此句可以佐證魯迅的積極趨向，雖然懷疑希望的存在，但對失望的消極情緒也有所懷疑，因認識到自身經驗的侷限，所以「對於熱情者們時常有同感，不斷為熱情者吶喊幾聲以助威」（曹聚仁 1937: 178-179）。然而，到了一九五六年《酒店》中，曹聚仁安排一位舞場大班的角色脫口而出了那句「絕望之為虛妄與希望同」，並解釋稱希望是空的，絕望也是空的，他這輩子已經完了（曹聚仁 2023: 99）。舞場大班對於這句話的理解未必直接對應了敘述者或作者本人的觀點，但曹聚仁在此援引魯迅來表達底層人物對未來徹底的悲觀和完全的放棄，顯然意有所指。在《酒店》的〈尾聲〉，曹聚仁全文引用了魯迅的〈淡淡的血痕中〉（1926）。開篇即是：「目前的造物主，還是一個怯弱者」。所謂怯弱，在於造物者暗暗使天變地異、生物衰亡、人類流血受苦，卻不敢毀滅這一切，也不敢讓人類永遠記得這些血色的恐怖，反而創造了使人可以醉生夢死的條件，譬如「微甘的苦酒」，淡淡的血痕使人們以為究竟勝於空虛（魯迅 1926: 3）。當年，魯迅因在「三·一八慘案」後支持進步學生，據傳被列入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名單，遂外出避難（魯迅 1981: 366）。魯迅在《〈野草〉英文譯本序》（1931）中回憶稱，〈淡淡的血痕中〉作於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眾後，「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魯迅 1932: 208-209）。曹聚仁在小說結尾處摘抄此文，自然剝離了當時的背景，卻意在援引魯迅關於政治與文藝的歧途之說。

魯迅究竟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是不是以及是何種意義上的虛無主義者，他對政治革命的態度是否一貫的消極，向來眾說紛紜，也並非本文所關切的重點。^[6] 值得細究的是，曹聚仁既然高度肯定了虛無主義藉由文藝創作而體現出來的思想與美學價值，並且多年來反覆研究並援引作家魯迅以表達其不同時期的心境，可見我們有必要將曹聚仁自己的創作納入研究的範疇，尤其是小說《酒店》不僅在時代背景上與〈虛無主義：灰色馬〉一文最為接近，且書中多次提及《灰色馬》的片段，男女主人公也都帶有佐治的色彩。

二、從《灰色馬》到《酒店》：殖民地香港的虛無主義羣像

《酒店》講述了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和澳門，一羣來自內地的新移民的悲歡離合，小說人物大多掙扎於社會底層，其中雖不乏曾經出身小康之家的青年男女，但在南下後都陷入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局，結局或人間蒸發，或自殺未遂，或瘋癲癡傻。由於大陸舊政權的奔潰，游資百川匯海，曹聚仁筆下的香港是一個「甚麼都是商品」的消費主義社會，其經濟畸形繁榮，又經常受到周遭局勢例如朝鮮戰事的影響而波動（曹聚仁 2023: 7, 105）。

藉由舞女與恩客之間的愛怨情仇，曹聚仁試圖解答香港社會的民生與人心問題。女主人公黃明中為救病重的寡母而下海賣身，有幸遇到了腰纏萬貫的恩客，誰知自己的積蓄也隨著對方的破產而付之東流；後來她愛上了一位年輕的擦鞋工，卻被另一交際花璐珊挖走，為了報復情敵，黃明中不惜致其毀容，誰料此舉反倒促成了擦鞋工與璐珊的結合，永失所愛的黃明中最終發了瘋。小說明確地形容黃明中是典型的「玩世不恭的虛無派」，相信人老珠黃不值錢，不如趁年輕「活一天享受一天，能怎麼痛快，就怎麼痛快！」（曹聚仁 2023: 106-107）。恰如《灰色馬》中的佐治不相信明天，卻信仰愛情甚至為此與情人的丈夫決鬥；黃明中也只信仰自己同擦鞋工的愛情，一旦遭背叛則恨不能你死我活。同樣將人生投注於情愛的還有璐珊，她甚至渴望同愛人廝守於一個烏托邦式的小島，那裏沒有戰爭、鬥爭、矛盾、仇恨，沒有虛假的宣傳、口號、標語乃至階級、國家和金錢（曹聚仁 2023: 114）。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敘述者藉交際花之口勾勒其心目中的烏托邦，一個徹底去政治化的理想社會，同時又去階級、去國家、去貨幣，似乎帶有些許共產主義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處在「左」、「右」夾縫中的南來知識份子，也就是曹聚仁的心境。

同樣的，男主人公陳天聲也是一個典型的虛無主義者，他與黃明中的區別在於太過膽小怯弱。陳天聲曾經留學法國，後任某地教育局長，娶妻生子，原本的生活一帆風順。一九四九年後，陳天聲不得已獨自前往香港討生活，以替人販賣古董為生，雖然豐衣足食，但念及內地的妻兒還在挨餓受凍，又不敢肆意享受。陳天聲的矛盾性在於，既與情人林弟有了私生子，又恐懼承擔責任，間接致使林弟不告而別而最終下落不明。陳天聲也是小說中最常引經據典的人物，他一共提到過四部作品，分別是美國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 1936)、清代小說《紅樓夢》、俄國小說《羅亭》(Рудин, 1856)以及路卜洵的《灰色馬》。雖然這四部作品的時代背景迥異，但陳天聲引以為同志的小說人物都具有感傷的消極色彩。譬如，陳天聲以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自比，自嘲是「手的侏儒，口的長人」(曹聚仁 2023: 235)。他引用《飄》中的衛希禮的一段懷舊之感，表示自己也是舊時代的人，「並不屬於這個瘋狂的殺人的現代，恐怕也不能適合於將來」(曹聚仁 2023: 224)。對於輝煌過去的想像式的眷戀，使得身處殖民地香港的陳天聲更覺悲涼，終於在物是人非的打擊之下，決定自殺。然而就在上吊之前，他忽然想起了《灰色馬》中佐治的一段獨白，於是默寫在了手帕之上：

現在我知道，我是倦於生活了。我對我的說話，我的思想，我的欲望都厭倦了——我厭倦一切人，厭倦他們的生活；他們與我之間，有一個東西間隔著，有許多神聖的界線，我的界線是血汗了的刀。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常常望著太陽，太陽盲我的眼，他的光燙熱我。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已知道愛，——我母親的溫和的愛情。我天真的愛一切人，我愛生命之樂。現在，我卻誰也不愛了。我不想愛，而我也不能愛了。生命在一小時裏，在我看來，變成一個可詛咒的空虛的東西，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曹聚仁 2023: 248）

陳天聲下決心要用死來解脫人間一切解脫不了的苦痛，遂覺得《灰色馬》的這番話「是從他的心胸中流出來的」(曹聚仁 2023: 248-249)。有趣的是，因沒錢、不得志、婚外情和私生子而走到窮途末路的陳天聲，忽然充分體認到了以暗殺為生的虛無黨人的精神困境，並引其肺腑之言作為自己的絕筆。

關於小說的結局，陳智德認為，雖然黃明中進了瘋人院，但曾被她所害毀容的情敵璐珊代替她照顧黃明中的母親，「恩怨撫平，消弭了人倫的對立，既喻示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也為那一整代被邊緣化的、流落於殖民地香港的『遺民』還以更人性化的位置」，這反映出了曹聚仁本身的政治想像，即「認清矛盾之所在，思考身份，消弭對立，寄託願望於烏托邦」，是一種最樂觀也最具體的政治想像(陳智德 21)。不過，若從陳天聲的結局看去，倒是另

一番虛無景況。不同於《灰色馬》用一把手槍來暗示死亡的必然性，曹聚仁為他的男主人公設計了一場自殺未遂的鬧劇。雖然未遂，但本埠新聞早已爭相報導，標題為「一位教育家的悲劇」，詳細報導並公開了陳天聲的遺言，使得這位虛無主義者於絕望中的吶喊最終淪為茶餘飯後的坊間笑料。

與其說《酒店》中的虛無主義是佐治式的，不如說是由金錢的「鞭打」所鍛造而成的。曹聚仁在小說中挪用了《使徒行傳》的故事，讓在雅典傳道的使徒保羅告訴眾人，唯一的真神叫做「金錢」：

他們對他的話毫不介意。但這位真神依然自行其道，經過了三百年無意義的騷擾與盲目的殘害，他已經把一切的神盡行推倒，就連皇帝都不得不向他低頭了。——這位真神，叫做「金錢」，別號稱為「經濟」。他的魂住在大陸，讓使徒們替天行道；他的魂留在海外，有蝦兵蟹將，興風作浪。（曹聚仁 2023: 110-111）

曹聚仁所謂金錢毫無憐憫地「把『鞭子』打在我們的身上」，不免讓人聯想到耶穌在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前所受的鞭刑，而《聖經》有云「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一般被解釋為耶穌用受難和死亡拯救了世人。然而，《酒店》所謂受金錢鞭打，是放棄掙扎而拜倒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下，喻示了救贖的不可能。同樣是鞭打，《灰色馬》中也有一則相關的故事，說一個車夫曾經很有錢，因被仇家放火燒屋而一無所有，於是咒罵一切甚至上帝，車夫只能拿著韁繩粗暴地鞭打他的馬，「當著馬的眼部打去」（路卜洵 22-23）。這故事的意義在於揭示佐治就像那車夫一樣，後者鞭打馬匹，而佐治直接殺人，他們都喪失了生命的動力，唯有施暴於他者才能從麻木中得到些許快慰。從《灰色馬》到《酒店》，從虛無黨的暗殺運動到殖民地香港的飲食男女，曹聚仁將生命中那些看似無法言說的究竟，明明白白地藉由他筆下的移民故事揭露出來，虛無主義的現實根源即風雲變幻的政治鬥爭與籠蓋四野的金錢之神。

結 語

透過《灰色馬》這本俄國小說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兩條不同的接受脈絡，其一是以鄭振鐸、瞿秋白、茅盾等人為代表的左翼知識人的批評路線，他們以該小說為研習俄國革命史與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試圖召喚革命青年，使其認識到正確的革命策略絕非暗殺而是動員民

眾的集體力量；其二，是以曹聚仁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灰色馬》直至其於一九五〇年代南下辦報、作文、寫小說的過程中始終如影隨形。本文的關切點在於藉助一本《灰色馬》而發見所謂左右兩派各自複雜且不同的動機，即使在左翼陣營內部，對於虛無主義也並不全是鐵板一塊的解讀，瞿秋白和茅盾試圖用革命史或思想史來解釋，而鄭振鐸選擇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理解。而曹聚仁在這一問題上則更為複雜，他對於虛無主義的看法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至一九五〇年代，發生了相當微妙的轉變，從一開始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烏鴉主義」，到後來漸趨不可言說的美學妙趣，再到《酒店》這本小說對於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鬥爭與殖民地香港的資本崇拜的描摹與暴露，顯然在曹聚仁身上，折射出知識分子與革命歷史之間比虛無主義更為複雜的多重面向，值得進一步再探。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言，使文章論述與結構更為清晰，特此致謝。

註釋

1. 鄭振鐸在一九二三年翻譯了俄國作家阿志巴綏夫的小說《沙寧》時，在譯者序中表示他的俄文程度幾等於零，所以直接從原文中譯出，遂請了耿濟之、瞿秋白兩位懂俄文的朋友進行校改（西諦 1924: 10）。
2. 鄭振鐸在〈譯者引言〉中已經交待(1922: 5)，也有《小說月報》的讀者來信詢問《灰色馬》之英譯本的出版信息，茅盾代為回覆的是都柏林與倫敦發行的“Maunsel and Co. Ltd.”（雁冰 1922: 9）。
3. 關於中國電影的「軟硬之爭」，當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黃嘉謨發表於《現代電影》的〈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其中對於軟性電影的界定成為後世頻繁援引的名句，即「電影是給眼睛喫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嘉謨 1933: 3）。
4. 黃若澤在研究中提出，小說中不同革命成員之間的分歧體現在他們對聖經的不同理解和運用之上，其中佛尼埃代表了對耶穌基督的虔誠信仰，而佐治代表了世俗革命傾向，理由是他二人就殺人問題進行論辯時，佐治表示「我們去殺人，是要叫此後沒有人會再被殺」。然而，這句話其實是佛尼埃所說的，黃若澤應是筆誤或記錯。不僅如此，佐治作為虛無主義者，他對革命在思想意識型態上的體認非常薄弱，很難將其與世俗革命傾向相聯繫（黃若澤 2019: 178-179）。
5. 趙稀方(1964-)認為《酒店》既不同於反共綠背文學，也不同於反反共的諷刺文學，而是從人文主義的角度揭示來港難民的悲劇。（趙稀方 2006: 94; 2014: 13）。持同樣的觀點的還有陳智德

(1969-)，他認為相較於被後來的文學史論述稱為「反共小說」、「難民文學」、「反蔣小說」的作品，《酒店》不標榜政治意識型態對立，而是側重於懷鄉、文化衝擊與精神壓抑的主題（陳智德 2011: 9）。

6. 增田涉(1903-1977)曾經同魯迅表達過他對虛無主義的看法，即「一切賢明的人，在他們心胸的深處藏著虛無的深淵」，而魯迅對此並不贊同，儘管其文章中不斷出現虛無主義的氣味，但有時卻說出完全輕蔑虛無主義者的話，出乎了增田涉的意料(1976: 26)。

徵引文獻

- 曹聚仁(1931)〈我們的顏色〉。《濤聲》，19 Dec.: 1-2。
- 曹聚仁(1932)〈請吳稚暉先生答客問〉。《濤聲》，23 Jan.: 2-3。
- 曹聚仁(1933)〈我與左聯與無政府主義〉。《濤聲》，29 Jul.: 1-2。
- 曹聚仁(1937)〈魯迅的性格〉。《文思》(上海：北新書局)，176-180。
- 曹聚仁(1956)〈虛無主義：《灰色馬》〉。文藝評介。《文藝新潮》，18 March: 10-12。
- 曹聚仁(1956a)《魯迅評傳》(香港：世界出版社)。
- 曹聚仁(2007)《採訪三記·採訪新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曹聚仁(2023)《酒店》(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陳桂生(1997)《「教育學視界」辨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智德(2011)〈一九五〇年代香港小說的遺民空間：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中國現代文學》no. 19 (Jun.): 5-24。
- 獨秀(1920)〈(八四)虛無主義〉。隨感錄。《新青年》8.1 (Sept.): 137。
- 獨應(2016)〈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天義·衡報》，(上)天義。萬仕國、劉禾(校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89-192。
- 范利偉(2014)〈清末暗殺風潮中的「虛無黨」：兼析「虛無黨」與虛無主義的關係〉。《俄羅斯文藝》no. 1 (Jan.): 22-29。
- 胡銘 [曹義](1931)〈從莫斯科歸來(二)：向莫斯科去〉。《濤聲》，14 Nov.: 2-3。
- 黃若澤(2019)〈從《啟示錄》到革命書：鄭振鐸《灰色馬》中的思想論辯〉。《聖經文學研究》no. 19 (Aug.): 169-203。
- 黃萬華(2013)〈從《文潮》到《文藝新潮》：一條不可忽視的文學史線索〉。《山東社會科學》no. 9 (Sept.)[217]: 58-66。
- 黃詠光(2020)〈亞洲之間思想遭遇的負面性轉移：瞿秋白與泰戈爾，1924〉。《中外文學》49.4 (Dec.)[471]: 155-202。
- 嘉謨(1933)〈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現代電影》，no. 6 (Dec.): 3。
- 金璐潔(2019)〈女學與革命：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的愛國女校〉。《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38.6 (Dec.): 62-68。

- 林丁、曹聚仁(1933)〈論上海文壇：林丁先生的來信〉。《濤聲》，12 Aug.: 6-8。
- 劉森林(2013)《物與無：物化邏輯與虛無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魯迅(1925)〈希望〉。《語絲》，19 Jan.: 3-4。
- 魯迅(1926)〈淡淡的血痕中：《野草》之二十二〉。《語絲》，19 Apr.: 3。
- 魯迅(1932)《二心集》(上海：合眾書店)。
- 魯迅(1981)〈《野草》英文譯本序〉。《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365-366。
- 毛澤東(1940)〈新民主主義論〉。《解放》no. 98-99 (Feb.): 22-40。
- 增田涉(1976)《魯迅的印象》(魯迅的印象)[1970]。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現代文學組(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瞿秋白(1923)〈《灰色馬》與俄國社會運動〉。《小說月報》14.11 (Nov.): 61-70。
- Ropshin, V. [路卜洵] [Boris Viktorovich Savinkov] (2012)《灰色馬》(*Конь бледный*)[1909]。鄭振鐸(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沈雁冰(1923)〈鄭譯《灰色馬》序〉。《文學》，5 Nov.: 1。
- 書報介紹(1924)《灰色馬》(*The Pale Horse*)書訊。路卜洵(V. Ropshin; Boris Viktorovich Savinkov)(著)；鄭振鐸(轉譯自英文)。《學生雜誌》11.4 (Apr.): 119-120。
- 田干生(1989)〈《項脊軒志》的寫作時間及主題考辨〉。《揚州師院學報》no. 3 (Oct.): 43-46。
- Turgenev, Ivan Sergeevich [伊凡·屠格涅夫](2000)《屠格涅夫全集》，第三卷。王智量、許磊然(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西諦(鄭振鐸)(1924)〈阿志巴綏夫與《沙寧》：《沙寧》的譯序〉。《小說月報》15.5 (May): 1-12。
- 雁冰[沈雁冰](1922) 通信。《小說月報》13.11 (Nov.): 1-9。
- 俞人、曹聚仁(1933)〈除了兩句空口號再也沒有什麼了〉。《濤聲》，7 Oct.: 7-8。
- 增愷(1924)〈《灰色馬》的運氣〉。《文學旬刊》，no. 29 (Mar.): 4。
- 趙稀方(2006)〈五十年代的美元文化與香港小說〉。《二十一世紀》no. 12 (Dec.)[98]: 87-96。
- 趙稀方(2014)〈五十年代香港的難民小說〉。趙滋著《半下流社會》、林適存《駝鳥》、張一帆《春到調景嶺》、邱永漢《香港》、洛風《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馬森《蘇絲黃的世界》書評。《甘肅社會科學》no. 3 (May): 11-15。
- 趙稀方(2017)〈論香港《文藝新潮》的翻譯〉。《中國比較文學》no. 4 (Oct.): 66-78。
- 鄭振鐸(1920)〈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新社會》no. 7 (Jan.): 1-3。
- 鄭振鐸(1922)〈《灰色馬》譯者引言〉。《小說月報》13.7 (Jul.): 1-5。
- 鄭振鐸(1998)〈《父與子》序言〉。《鄭振鐸全集》，第一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401-405。

-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1903)〈論俄羅斯虛無黨〉。《新民叢報》no. 40-41 (Sept., Nov.): 59-75。
- 朱謙之(1919)〈虛無主義的哲學〉。《新中國》1.8 (Dec.): 48-59。
- 最後一頁(1922)《小說月報》13.7 (Jul.): 8。

WORKS CITED

- Cao Ju-Ren (1931) “Women de yanse” [“Our Colors”]. *Taosheng [The Sound of Waves]*, 19 Dec.: 1-2.
- Cao Ju-Ren (1932) “Qing Wu Zhi-Hui xiansheng da kewen” [“Ask Mr. Wu Zhi-Hui to answer the guest’s questions”]. *Taosheng [The Sound of Waves]*, 23 Jan.: 2-3.
- Cao Ju-Ren (1937) “Lu Xun de xingge” [“Lu Xun’s Character”]. *Wensi [The Thought of Literature]* (Shanghai: Beixin Bookstore), 176-180.
- Cao Ju-Ren (1933) “Wo yu Zuolian yu Wuzhengfu zhuyi” [“Me and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and Anarchism”]. *Taosheng [The Sound of Waves]*, 29 Jul.: 1-2.
- Cao Ju-Ren (1956) “Xuwu Zhuyi: *Hui Se Ma*” (“Nihilism: *The Pale Horse*”). Literary Criticism. *Wenyi Xinchao [Literary Current Monthly Magazine]*, 18 March: 10-12.
- Cao Ju-Ren (1956a) *Lu Xun Ping Zhuan [Commentary and Biography of Lu Xun]* (Hong Kong: World Press).
- Cao Ju-Ren (2007) *Caifang Sanji. Caifang Xinji [The Third Interview Record. The New Interview Recor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Cao Ju-Ren (2023) *Jiu Dian [Hotel]*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 Chen Gui-Sheng (1997) “‘Jiaoyuxue shijie’ bianxi” [“Analysis of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Chen Zhi-De (2011) “Yijiuwuling niandai Xianggang xiaoshuo de yimin kongjian: Zhao Zi-Fan *Banxialiu shehui*, Zhang Yi-Fan *Chun dao Diaojingling* yu Ruan Lang *Mou gongguan sanji*, Cao Ju-Ren *Jiu dian*” (“Loyalist Existence of Hong Kong Fiction in the 1950s: Zhao Zi-Fan’s Struggle of Humanism, Zhang Yi-Fan’s *Chun dao Tiaojingling* and Ruan Lang’s *Mou gong guan san ji*, Cao Ju-Ren’s *Jiu d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no. 19 (Jun.): 5-24.
- Duxiu (1920) “(bashisi) Xuwu Zhuyi” (“no. 84 Nihilism”). *Sui gan lu* (Impressionistic Record). *Xin qing nian [La Jeunesse]* 8.1 (Sept.): 137.
- Duying (2016) “Lun Eguo geming yu Xuwu zhuyi zhi bie”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ussian Revolution and Nihilism”). Shi-guo Wan, Lydia H. Liu (eds.): *Tianyi. Hengbao (Natural Justice and Equity)*, vol. 1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89-192.
- Fan Li-Wei (2014) “Qingmo ansha fengchao zhong de ‘Xuwudang’: Jianxi ‘Xuwudang’ yu Xuwu Zhuyi de guanxi” (“The ‘Nihilist Party’ amidst the

- Assassination Wav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ihilist Party’ and Nihilism”). *Eluosi wenyi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s)*, no. 1 (Jan.): 22-29.
- Hu Ming [Cao Yi] (1931) “Cong Mosike guilai: Xiang Mosike qu” [“Back from Moscow: Go to Moscow”]. *Taosheng [The Sound of Waves]*, 14 Nov.: 2-3.
- Huang Ruo-Ze (2019) “Cong Qishilu dao geming shu: Zheng Zhen-Duo *Huise Ma zhong de sixiang lunbian*” (“From Revelation to Revolu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llectual Debates in Zheng Zhen-Duo’s *The Pale Horse*”). *Shengjing wenxue yanjiu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o. 19 (Aug.): 169-203.
- Huang Wan-Hua (2013) “Cong *Wen Chao* dao *Wenyi Xinchao*: Yitiao bukehushi de wenxueshi xiansuo” (“From *Wen Chao* to *Literary Current Monthly Magazine*: An Unignorable Thread in Literary History”). *Shandong Shehuikexue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no. 9 (Sept.)[217]: 58-66.
- Huang Yong-Guang (2020) “Yazhou zhijian sixiang zaoyu de fujianxing zhuan” (“The Negative Transference in Inter-Asian Encounters: Qu Qiubai and Tagore, 1924”). *Zhong Wai Wenxue (Chung Wai Literary)* 49.4 (Dec.)[471]: 155-202.
- Jiamo (1933) “Yingxing yingpian yu ruanxing yingpian.” *Xiandai Dianying*, no. 6 (Dec.): 3.
- Jin Lu-Jie (2019) “Nü xue yu geming: Ershi shiji shangbanye Shanghai de aiguo nü xiao” (“Female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Patriotic Girls School in Shanghai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Zhengzhou hangkong gongye guanli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38.6 (Dec.): 62-68.
- Lin Ding, Cao Ju-Ren (1933) “Lun Shanghai wentan: Lin Ding xiansheng de laixin” [“On the Literary Scene in Shanghai: A Letter from Mr. Lin Ding”]. *Taosheng [The Sound of Waves]*, 12 Aug.: 6-8.
- Liu Sen-Lin (2013) *Wu yu Wu: Wuhua luoji yu Xuwu Zhuyi [Object and Nothingness: Reification Logic and Nihilism]* (Nanjing: Jiangsu Renmin Press).
- Lu Xun (1925) “Xi Wang” (“Hope”). *Yu si [Tattler]*, 19 Jan.: 3-4.
- Lu Xun (1926) “Dandan de xuehen zhong: Yecao zhi ershier” (“Amidst Faint Bloodstains: *Wild Grass*-22”). *Yu si [Tattler]*, 19 Apr.: 3.
- Lu Xun (1932) *Er Xin Ji [Two Hearts]* (Shanghai: Hezhong Bookstore).
- Lu Xun (1981) “*Ye Cao* yingwen yiben xu” [“The preface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ild Grass*”]. *Lu Xun Quan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365-366.
- Mao Ze-Dong (1940) “Xin Minzhu Zhuyi Lun” (“On New Democracy”). *Jiefang [Liberation]*, no. 98-99 (Feb.): 22-40.
- Masuda Wataru (1976) *Lu Xun de Yin Xiang [Impressions of Lu Xun]*. Trans. Modern Literature Group,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Qu Qiu-Bai (1923) “*Huise Ma* yu Eguo shehui yundong” (“*The Pale Horse* and Russian Social Movement”). *Xiaoshuo Yuebao*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4.11 (Nov.): 61-70.
- Ropshin, V. [Boris Viktorovich Savinkov] (2012) *Huise Ma* (*Конь бледный*) [1909]. Trans. Zheng Zhen-Duo (Hefei: Anhui Renmin Press).
- Shen Yan-Bing (1923) “Zheng yi *Huise Ma* xu” [“The Preface of *The Pale Horse* translated by Zheng”]. *Wenxue* (*Literature*), 5 Nov.: 1.
- Shubao jieshao [introd. to books and newspapers] (1924) Rev. of *Huise Ma* (*The Pale Horse*), trans. Zhen-Duo Zheng. *Xuesheng Zazhi* (*The Students’ Magazine*) 11.4 (Apr.): 119-120.
- Tian Gan-Sheng (1989) “*Xiangjixuan Zhi* de xiezuo shijian ji zhuti kaobian” (“The Composition Time and Theme Analysis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y of Xiang Ji Xuan*”). *Yangzhou Shiyuan Xuebao* [*Journal of Y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no. 3 (Oct.): 43-46.
- Turgenev, Ivan Sergeevich (2000) *Tu Ge Nie Fu quanji*, vol. 3 [*The Complete Works of Turgenev*]. Trans. Wang Zhi-Liang, Xu Lei-Ra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 Xidi [Zheng Zhen-Duo](1924) “Azhibasufu yu *Shanin*” (“Arcybaszew and *Sanin*: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of *Sanin*”). *Xiaoshuo Yuebao*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5.5 (May): 1-12.
- Yanbing [Shen Yan-Bing] (1922) Tong xin (Correspondence). *Xiaoshuo Yuebao*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3.11 (Nov.): 1-9.
- Yu Ren-Sheng, Cao Ju-Ren (1933) “Chule liangju kong kouhao zaiye meiyou shenme le” (“There’s Nothing More beyond Two Empty Slogans”). *Taosheng* [*The Sound of Waves*], 7 Oct.: 7-8.
- Zengkai (1924) “*Huise Ma* de yun qi” [“The Luck of *The Pale Horse*”]. *Wenxue Xunkan*, no. 29 (Mar.): 4.
- Zhao Xi-Fang (2006) “Wushi niandai de Meiyuan wenhua yu Xianggang xiaoshuo” (“‘Greenback Culture’ and Hong Kong Novels in the 1950s”). *Ershiyi Shiji* (*Twenty-First Century*), no. 12 (Dec.)[98]: 87-96.
- Zhao Xi-Fang (2014) “Wushi niandai Xianggang de Nanmin Xiaoshuo” (“Refugee Fiction in 1950s Hong Kong”). Rev. of *Banxialiu shehui* by Zhao Zi-Fan, *Tuo Niao* by Lin Shi-Cun, *Chun dao Tiao Jing Ling* by Zhang Yi-Fan, *Xianggang* by Qiu Yong-Han, *Mou gongguan sanji* by Luo Feng, *Jiu Dian* by Cao Ju-Ren, *The World of Suzie Wong* by Richard Mason. *Gansu shehuikexue* (*Gansu Social Sciences*), no. 3 (May): 11-15.
- Zhao Xi-Fang (2017) “Lun Xianggang *Wenyi Xinchao* de fanyi” (“On Translations of *The New Tren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Hong Kong”). *Zhongguo Bijiao Wenx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4 (Oct.): 66-78.
- Zheng Zhen-Duo (1920) “Shehui fuwu” (“Social Service”). *Xin Shehui* (*New Society*), no. 7 (Jan.): 1-3.

- Zheng Zhen-Duo (1922) “*Huise Ma yizhe yinyan*”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of *The Pale Horse*”). *Xiaoshuo Yuebao*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3.7 (Jul.): 1-5.
- Zheng Zhen-Duo (1998) “*Fu yu Zi Xuyan*” (“The Preface of *Fathers and Sons*”). *Zheng Zhen-Duo Quanjì*, vol. 1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eng Zhen-Duo*] (Shijiazhuang: Huashan Art and Literature Press), 401-405.
- Zhongguo zhi xinmin [Liang Qi-Chao] (1903) “Lun Eluosi Xuwudang” [“On Russian Nihilist Party”]. *Xinmin Congbao* [*The New People’s Gazette*], no. 40-41 (Sep., Nov.): 59-75.
- Zhu Qian-Zhi (1919) “Xuwuzhuyi de Zhexue” (“The Philosophy of Nihilism”). *Xin Zhongguo* [*New China*] 1.8 (Dec.): 48-59.
- Zuihou yiye (1922) *Xiaoshuo Yuebao*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3.7 (Jul.): 8.

Nihilism as an Ideology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Russian Novel
The Pale Horse in China (1920-50s)

SHAO Yu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begins by revisiti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Pale Horse* in China, analyzing how it builds upon past understandings of Russian nihilism and nihilistic tendencies, while also connecting with early leftist intellectual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ubsequently, using Cao Ju-Ren’s analysis of *The Pale Horse* as a guide,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nihilistic” writings, unraveling a nuanced ideological context regarding revolution and nihilism that defies categorization by either the left or right. Within the leftist camp itself, interpretations of nihilism aren’t universally agreed upon. Qu Qiu-Bai and Mao Dun attempted to interpret the protagonist George through revolutionary or national historical lenses, while Zheng Zhen-Duo chose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Similarly, Cao Ju-Ren’s definition of nihilism evolved over time, from the initially critical “Crowism” to later, more ineffable philosophical musings, culminating in *Jiu Dian*, a novel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Pale Horse*, which exposes and depicts the twisted prosperity of 20th-century China’s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colonial Hong Kong. This reflects the intricate and multifaceted interplay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ary history.

KEYWORDS: Nihilism, *The Pale Horse*, Zheng Zhen-Duo, Qu Qiu-Bai, Mao Dun, Cao Ju-Ren